

影响纺织品保护的主观因素

周 旻

摘要：文物保护是一门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客观性是这门学科的主流。但是不可否认，在对文物实施保护的过程中同时存在许多主观因素，直接影响着保护理念和保护实践。以往，人们对保护的客观性比较重视，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切入，重新审视主观因素是如何影响纺织品文物的保护。

关键词：纺织品保护 主观因素

一、前 言

中国古代纺织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相对于其他类别的文物而言，针对纺织品文物而开展的保护相对薄弱，关于纺织品文物保护的理念研究更是匮乏。在国外，类似的理念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纺织品保护的实践在相关理念的指导下，呈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1987年，美国保护协会召开年会，会上对纺织品保护师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背景重新进行了界定。与以往的概念相比，纺织品保护师在保护修复方面应该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背景大大扩展，首次在科学和哲学的高度对纺织品保护师提出要求，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敬业精神，同时对文物心怀尊敬，这些迹象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伦理学引进文物保护领域。

对于文物保护领域而言，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许多纺织品保护师在设计保护方案时，似乎并没有体会到伦理学的真正内涵，更无须奢谈将之贯彻执行到具体的保护进程中。那么，在众多保护师心中，什么才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呢？长久以来，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保护方案的选择？

一般，在制定保护方案之前，保护师应该对保护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分析检测，尽可能全面细致地了解文物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和保护措施。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保护方案的选择往往取决于针对保护对象而采取的一系列客观评估，似乎与保护师的主观因素无关。但是笔者认为，面对一件特定的纺织品文物，在制定具体可行的保护方案时，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这种分歧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见仁见智，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保护师的文化素质以及个人好恶，也就是说，主观因素直接影响着纺织品文物的保护。

为了清晰公正地阐述这些主观因素在保护过程中的影响，本文花费大量笔墨，旨在说明虽然追求客观是保护的终极目标，但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绝对客观的保护实质上并不存在。

二、影响保护方案的因素

（一）纺织品的类型

在制定保护方案时，纺织品的类型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纺织品的类型可以大致划分如下：织锦壁挂、服饰、宗教纺织品、考古出土纺织品、地毯、床单被褥等家用纺织品、装饰用纺织品、旗帜、历史文书等。

在文物保护大家庭中，纺织品文物的保护是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但是根据处理对象的不同，这一狭小领域又被划分为若干个截然不同的流派。面对不同类型的纺织品，不同流派在保护实践中汲取了大量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保护理念。长久以来，每个流派秉承着各自的理念，并以此为准则指导具体实践，呈现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由于保护理念的不同，不同流派之间往往争执不断——一个流派视作经典的标准，往往会被另一个流派嗤之以鼻，此谓“流派之争”。

如今，由于知识的系统归一，不同流派之间开始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流派差异渐渐弱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个流派之间的差异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在此历史背景下，不难想象，面对同一件纺织品文物，不同流派的保护师在进行保护时一定会有不同思路和方法。

（二）保护师的鉴赏

保护师的鉴赏并不能等同于鉴定师的鉴定，这种鉴赏只是基于保护师的学术背景对纺织品文物的理解，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往往难以琢磨，没有定规。在制定保护方案的过程中，保护师的主观鉴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在博物馆体系中，保护与鉴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但是由于保护师直接与文物接触，可以获取大量的实物资料；如果虚心好学，保护师还可以从各个途径获取大量背景知识，这些途径包括收藏家、鉴定专家、学者甚至拍卖行。在众多途径的交叉渗透之下，保护师日积月累地增长着鉴定常识和鉴赏能力。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保护师，不仅应该具备娴熟运用技术分析手段的能力，还应该在文物鉴赏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使保护和鉴赏相得益彰，制定出更加具有客观性的保护方案。

保护师从各种途径获取与保护对象相关的信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保护师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在信息整合的过程中，保护师必然运用到各种学科知识，如肖像学、年代学、人类学、美学、工艺学、材料学、化学等，在此意义上，保护是一门边缘交叉学科，需要极其庞杂的知识体系，可以说，一个保护师的知识体系越广博庞杂，其制定的保护方案越全面可靠。

鉴赏是一个主观意味非常浓厚的过程，人在鉴赏过程中往往会注入自己的感情色彩，致使认知偏移客观实际，这种偏移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对纺织品的敬畏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具有宗教意义的纺织品上，著名的耶稣裹尸布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类极具宗教意味的纺织品往往会对信徒产生神奇的心理暗示，在这种崇敬心理的影响下，认知不可避免会发生偏移。

如果说对耶稣裹尸布的敬畏心理是崇敬,那么对萨满教玩偶的敬畏更多的是恐惧。在人们眼中,萨满教颇具灵异色彩,面对一件如此灵异的纺织品,保护师的心中也许会被恐惧笼罩,在此情形下,对文物的认知也会发生偏移。

(2) 对纺织品文化内涵的歧解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艺术品通常是社会审美取向的折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弗洛伊德眼里,一块普普通通的地毯也许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关系到人类的情爱,这种人为赋予的内涵往往脱离其本体,并不是纺织品文物的实质所在,如果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这种心理学的牵强附会就是一种明显的歧解。

另外,纺织品的文化内涵与其所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当纺织品处于原生态时,纺织品自身与周围环境共为一体,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完整的。纺织品一旦脱离了土生土长的原有环境,作为一种艺术品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此时纺织品的文化内涵发生了解构,如果不对其来龙去脉有充分了解,就会对之歧解,产生认知偏移。

(3) 片面追求纺织品的原貌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历经岁月的洗礼,纺织品文物往往早已面目全非,要想完全恢复本来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总是有人孜孜不倦地试图使时间倒转,为了重现原貌,对纺织品文物施加过多过滥的保护措施,这是不可取的。

(4) 纺织品文物的市场价值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期,文物市场一直影响着纺织品文物的保护。纺织品文物一旦进入市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商品,对于商品而言,品相是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某些破损严重的纺织品文物,经过修复保护,品相得以改善,市场价格也随之攀升。在利益的驱动下,对文物本身的认知会发生偏移。

(5) 文物所有者的身份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面对同一件纺织品文物,不同主旨的博物馆——如艺术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会有不同的解读,至于私人收藏家更是见仁见智了。如果艺术品的所有者是拍卖商,其对保护的理解一定与博物馆所持观点大相径庭。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RATTI 纺织品保护中心的保护师曾经来中国丝绸博物馆做过讲座,期间她展示了一张补子的幻灯片,她说这件完整的补子是从一件残破的补服上拆下来的,拆除了补子的补服已经不属于馆藏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一个侧重于艺术的文化机构,在选择馆藏时更加侧重于文物的艺术价值,拆除补子的残破补服显然不在收藏之列。笔者也曾经在资料上看到,欧洲的一些博物馆在对待出土纺织品时,采取的是全盘保留的思路。例如,面对一件湖泊底泥里出土的纺织品,他们会将之连同封护在表面的淤泥一起保留,这也许代表了某些历史类博物馆的做法——尽可能多地保留文物在出土时的信息,留待日后破译。这两种情形也许代表着国外艺术类和历史类博物馆的两种不同保护思路,在中国,大部分博物馆属于综合类博物馆,上述两种做法都显得相对偏颇。

(6) 对纺织品文物的美学关注而导致的认知偏移

如果单纯从美学角度来考察纺织品文物,文物的品相也许不是唯一评判标准——对于一些出土文物,褴褛破旧意味着历经岁月,体现出阅尽沧桑的温馨;但是对于一些传世品,品相不佳就很难令人接受,人们一般希望传世的纺织品完整挺刮干净。

三、纺织品的类型和保护师的鉴赏相结合，成为影响纺织品保护的決定因素

如果说，纺织品的类型和保护师的鉴赏是影响纺织品保护的两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只有当两者相结合，才对保护方案的确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在上述两个因素中，前者客观，比较有据可依，后者主观，似乎无迹可寻。至于这两个因素是如何相结合，又是如何对纺织品的保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通过分析归纳，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其一，对于富有宗教色彩、历史意义的纺织品，鉴赏心理多数表现为敬畏，甚至无端衍生其文化内涵；

其二，对于深受市场青睐的地毯、织锦挂毯、绣品等，保护时更加偏重品相的改善；

其三，对于服饰等家用纺织品，收藏者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修养是影响保护的直接因素。

首先，来看看对纺织品的敬畏心理是如何影响保护师对保护方案的选择。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对耶稣裹尸布的保护，众所周知，耶稣裹尸布、圣物箱、圣骨匣都是极具宗教意味的纺织品，面对这类纺织品，保护师在确定保护方案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到敬畏心理的影响。在教徒心中，这些纺织品无异于圣物。其实，宗教崇拜不仅仅存在于基督的世界，每个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所有影响保护师抉择的心理因素之中，敬畏是最强烈的一种。且不说耶稣裹尸布那种罕见的宗教纺织品，即便面对一件极其普通的圣徒外衣，有些保护师出于敬畏，也许会觉得上面沾染的尘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尘土，似乎也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不可亵渎。不难想象，对宗教充满虔诚敬畏心理的保护师，在处理宗教纺织品时，势必会全盘保留其现状，包括污染物。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就是为将来保留下完整的历史信息。

对于考古出土的纺织品，如果保护师对其背景知识知之甚少，无法确切理解其文化内涵，势必会影响到保护方案的选择，甚至会采取一些错误的保护方法。过去，每当有墓葬出土纺织品，保护师会依照惯例对其进行清洗、平整，有时候出于研究目的，保护师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会尽量把所有的细节展示出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埃及木乃伊的处理。最早保护师在处理木乃伊时，会把裹尸带一层一层地从尸身上剥离。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保护师已经意识到，维持木乃伊的完整性是必须的，简单粗暴地将裹尸带从木乃伊上剥离，实质上已经大大破坏了其完整性，在此过程中流失了大量宝贵的历史信息。究竟是什么促使了这些变化的发生呢？一方面，在过去的若干年，人们已经剥离了太多的木乃伊，昔日的热情和好奇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从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看待出土纺织品，开始意识到应该尊重各类文化遗存，这种尊重不仅仅是敬畏，也许这就是伦理学在文物保护中的初发端倪。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如今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对于一件出土的纺织品，应该尽量避免对其扰动，为其营造一个相对恒定的环境即可。

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纺织品，如纳粹党旗、美国3K党人的长袍等，往往会遭遇保护师的歧视，这是因为这类特殊的纺织品通常使人产生不快的联想。为了尽量消除这种心理上的不快，这类纺织品在保护过程中往往受到过滥的处理，保护师似乎总想把它清洗得更加彻底干净。其实，尽管这类纺织品使人不快，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就其具有的历史意义而言，它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这类珍贵的历史文物,不应该施加过滥的保护处理。推而广之,对于任何类型的纺织品,过多过滥的保护都会使之丧失大量的信息,无形中削弱了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这一点是公认的。

在文物市场上,地毯、织锦壁挂、刺绣都是极受青睐的纺织品,此时影响保护方案的主要因素在于对品相的追求和市场的取向。正如上文所述,对纺织品的敬畏会抑制保护手段的实施,与此相反的是,在市场作用力的推动下,人们势必更加注重纺织品的品相,显然,品相好的纺织品无疑可以卖一个好价钱。狂热追求文物的品相,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文物要受到更多更滥的保护。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纺织品的保护往往会落入俗套,更多的成分是美化。

在此,有必要提到修复师这个概念。显然,在纺织品文物保护领域,保护师和修复师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有所交叉,更是各有侧重。至于保护师到底应不应该参与到修复过程中,一直有争执。有一种观点强烈反对把传统修复纳入纺织品保护的范畴,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纺织品保护界一直有意识地将保护和修复区别开来。但是,在过去几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修复,一些极具天赋的修复师用自己的双手挽救了无数纺织品文物,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人们似乎意识到这些传统的修复技艺是经验的结晶,也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也是不容忽视的。修复师长期以来所采用的技艺,此时得到充分的肯定,有些流派甚至将其规范化,所有的修复过程也视作保护的一部分。

当市场作用力和追求品相的渴望合而为一时,保护师开始寻求修复师的帮助,希望通过某些修复手段使纺织品焕发活力,此时修复在保护过程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不容忽视的是,对文物品相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文物市场,许多博物馆也热衷于此,我们经常在博物馆的文保实验室,看到正在修复的纺织品。为了使修复区域更加接近原件,博物馆不遗余力地配备设施,如专门的丝线染色、精确的色彩匹配等。

在所有的纺织品中,织锦也许是最值得修复的品种,因为织锦是以纹样见长的,其主要艺术价值在于纹饰的美丽。另外,织锦一般比较厚实,其强度能够承受修复。因此,织锦的修复历史由来已久。据资料记载,早在700年前人们就开始修复织锦壁挂,目前现存的最早实例是300年前的。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织锦壁挂都有必要进行修复,人们可以根据其保存状况,审美取向以及经费预算,选择灵活多变的保护方法。

同样,在修复地毯、被褥等品种的纺织品时,美化的成分也占了很大比重,这不仅是恢复纹样的需求,更是收藏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包含力是多元的,市场上流通的纺织品有不同出处,有些保存非常完好,有些已经是破旧不堪,但是从大众的审美观点出发,品相上佳的纺织品是最受欢迎的。纺织品文物一旦流入市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纯粹的商品,在利益的驱使下,大部分拍卖商、古董商都希望纺织品在客户面前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品相。在这种情形下,博物馆也许是一块净土可以容纳纺织品维持原有状况,也许只有在博物馆,破旧褴褛的纺织品才能栖身。总而言之,博物馆收藏的纺织品和市场上流通的纺织品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保护思路截然不同。现在人们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区别对待两个不同范畴的纺织品——博物馆收藏的纺织品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维持原来面貌,进入市场的纺织品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和翻新,但是这种修正和翻新并不是随意的,也应该依照一定的规范,为此美国保护协会特意制定了操作规范。

正如上文所述,在主观因素的主导下,纺织品保护领域的确存在着两种迥异的保护思路,要么出于对纺织品的敬畏而过于谨慎,要么出于美化的目的对纺织品施加过滥的保护手段,显然这两种做法都不够中庸,换而言之就是不够客观。

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对于大多数纺织品而言,如服饰、家用装饰品等,这类纺织品大多以实用为主,不像耶稣裹尸布那样具有宗教意义,也不像织锦壁挂那样具有艺术收藏价值,此时收藏者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素养是影响其保护的重要因素。此时,保护师应该尽量与收藏者沟通,在保护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依照客户的心愿对其实施保护。可以说,此时保护师需要在客户需求和保护规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博物馆在传承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无可或缺的角色,纺织品文物保护的对象以考古纺织品为主,同时涉及传世古代纺织品和近现代的重要纺织品。如今,在纺织品保护领域似乎非常流行将一件纺织品美化得完美无缺,这似乎与近现代纺织品和传世纺织品的审美取向有关。在此,必须澄清的是,针对不同来源的纺织品,应该采取不同的审美观和不同的保护思路,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追求保护的客观性是每个纺织品保护师的初衷,但不可否认的是,纺织品文物保护的过程,往往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客观因素包括科学分析、史学知识、保护知识等,主观因素包括个人鉴赏能力、市场价值观、宗教禁忌等。

其实,在各个领域都不可忽视主观因素的存在,至于主观因素对纺织品保护的孰是孰非,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通过本文,笔者想表明一个个人观点:既然在纺织品保护中不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存在,那么就去正视这种存在。对于纺织品文物保护这个相对薄弱的领域,正视往往是成熟的开始。

作者单位:周 暘,中国丝绸博物馆

联系方式:浙江省杭州市玉皇山路73号,邮编310002